

多维认知与多元治理：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研究^{*}

王 昉 王晓博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带领中国人民为摆脱贫困、改善最广大群体的福祉进行了长期艰苦奋斗。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以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从社会制度、国际环境、生产关系等角度剖析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并结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主张通过改变国家制度、加强社会组织与提升人力资本等来改变贫困状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思想与实践,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不仅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也为当今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多维认知 多元治理 中国共产党 反贫困思想

一、导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十年来经历的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①这一重要成就,同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定位相契合,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国家社会发展前进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核心目标。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以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对近代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论述为指引,不断在实践中探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为中国百年来反贫困事业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和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构成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反贫困思想,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尽快摆脱贫困的主张;^②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减贫政策与实践。^③整体看来,第一,现有研究集

[作者简介] 王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王晓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反贫困思想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检验研究”(批准号:18BJL014)、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201109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 页。

② 张瑞敏、吴森森《陈独秀的救贫观论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③ 周良书、匡颖晨《中国共产党减贫思想的演进与启示》,《社会治理》2020 年第 11 期;白永秀、王颂吉《中国共产党 100 年经济思想的主线、发展阶段与理论体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中于对具体人物思想的梳理,未能展现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的总体特征;第二,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探索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不足以充分揭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系统认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贫困问题的剖析以及为消除贫困进行的探索和努力,揭示这一时期反贫困思想的来源、基本观点及时代特征,从而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向共同富裕迈进的历史伟业。

(一) 历史时段的界定

学术界就“中国共产党早期”相关问题展开论述时,大多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但通过其研究内容能够大致勾勒考察范围。不同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一致,但基本以五四运动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起点。^①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下限也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持续到大革命时期,^②有的学者则将其延伸到遵义会议。^③本文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范围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由成立到寻求革命新道路并不断壮大阶段的阶段,反贫困实践相对丰富,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关于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较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④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分析中国实际情况的条件和能力。

(二) 史料的选取及处理方法

本文研究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著作与译著;另一类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布的与反贫困相关的政策文件。对第一类文献的筛选主要采取追溯法,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集以及当代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为线索,提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⑤对第二类文献的筛选则利用相关数据库和系列文献丛书,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布的涉及反贫困政策的文件进行梳理。

丰富的史料为本文提供了较扎实的研究基础,但这些资料分散于报刊和政策文件间,且夹杂于对近代纷繁复杂社会问题的讨论中,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选取和整理。针对史料的处理有以下两点说明:第一,受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讨论贫困问题时,多将其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相联系。为了分析的全面性,本文将能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要素的各种文献(刊物文章、政策文件等)均纳入考察范畴。第二,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对贫困问题的讨论并不局限于中国,他们对俄、法等国的贫困现象也有阐述,这些论述多见于其译著序言和内容的注释中,因而此类文献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溯源、概念认知与路径探索

十月革命的爆发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引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中国传统济贫思想的共同作用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贫困的概念、贫困产生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路径上,都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观点。

^① 孙晶《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1919—1923)》,《观察与思考》2019年第6期;张仰亮《中国共产党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运作(1921—1927)》,《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② 马思宇《无形与有形:中共早期“党团”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③ 张侃《从宗族到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基层政权建设——以1929—1934年的闽西赣南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④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

^⑤ 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时,采用过多种笔名、化名,直接从近代刊物上寻找易导致文献遗漏。因此,我们采用了以前人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取早期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文章的处理办法。

(一)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溯源

1. 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吸收和借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长期贫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提出了消灭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目标。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剖析了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劳动者权利的缺失,而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使工人“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①二是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造成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②使工人成为活的、贫困的资本,^③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与痛苦。三是阶级对立。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财富的累积是以无产阶级贫困的累积为代价的。这种畸形发展方式导致“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④

作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接受者与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寻求救国图强、改善贫困大众生活的道路。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李大钊将“余值”称为“资本家的掠夺品”,而“余工”则是“工人分外的工,一点报酬也没有”。李大钊指出,存在这种人剥削人的现象,并不是因为个别资本家的贪婪,而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⑤因此他提倡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为工人阶层争取利益。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也对“什么是剩余价值”作了说明。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导致了土地私有和资本集中,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能全部归自己所有时,这一“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之间之差额”,“就叫做剩余价值”。^⑥

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启蒙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正是资产阶级以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然而由于“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不能正确认识自身陷于贫困的原因,往往将“穷乏惨苦归之命”。^⑦蔡和森倡议,运用“马克思的革命说”来唤醒同阶级(那些暂未意识到贫困真正根源的无产阶级群体)觉悟,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与劳工运动相结合。^⑧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素养,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并定期给工人们上课,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为工人群众解释无产阶级遭受贫困和苦难的原因。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充分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公有制对消除贫困的重要作用。1920年,通过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变革社会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消除社会贫困,被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理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宣言》。

2. 对中国传统民本和济贫思想的继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⑨“传承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⑩高度肯定了中国传统济贫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本思想和济贫理念,在传承发展中不断彰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1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⑤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

⑥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

⑦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⑧ 《蔡和森文集》,第77页。

⑨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⑩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显其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为近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思想来源。首先,中国古代民本经济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将富民、养民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管子、孔子等古代思想家均有富民治国、重视社会稳定的主张,将救济穷弱视为政治安定、君权稳固的重要手段。老子也提出“以百姓心为心”,强调体恤百姓,与民休养生息。这些论述体现了古代民本经济观的基本理念,即要以民为本,让百姓过上富足生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①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主要采取国家主导、民间辅助的救助模式。政府为社会救助的主体,除了灾情时期的临时物资救助,平常年份还通过“常平仓”制度稳定物价,这种跨地区、跨时间的缓冲储备机制对后世影响深远。民间的救助主要以宗族救济和慈善组织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救助在地域和时间上的不足。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反贫困理念,将民众的稳定生活视作社会稳定的前提,将消减贫困和国家治理相联系。李大钊提出“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②农民的痛苦与无知是社会性的问题。当广大群众被压迫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组织革命,影响国家和政权稳定,因此反贫困一定要惠及最广大的群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古代“调粟”的救荒理念,在革命根据地成立粮食调剂局作为平糶机关,负责粮食的跨地域、跨季节调剂,保证红军及政府给养,并帮助改善工农生活。^③这一机构的设立,对调节根据地内部粮食流通、保障军民基本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贫困概念的认知与根源考察

理论界普遍认同贫困是一个多元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综合表现形式。^④但由于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变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对贫困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呈现动态性和历史性,贫困的内涵也由狭义上的物质贫困逐渐扩展至政治、社会、制度意义上的广义贫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贫困类型进行区分并展开的诸多论述,反映了他们对贫困这一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入,为他们探索贫困治理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⑤处于绝对贫困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理功能的最低需求。近代学者在实际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几乎都得出了中国存在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结论。^⑥除了绝对贫困,近代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相对贫困指虽然人们的收入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依然低于社会平均标准状况。^⑦这意味着一个人贫困与否不仅取决于本人的收入,还受社会中其他人收入水平的影响。陈独秀将穷人和富人的生活进行对比,认为人类的贫困不单是食物一项,而是包括衣、食、住、知识、娱乐等方面不足者与充足者相比较的现象。^⑧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所谓相对的贫穷,就是说劳动者在社会收入中所得的部分降低了。所谓绝对的贫穷,就是说劳动者生活水准降低、工资减少、消费资料的价格提

① 叶坦、王昉《对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传承与超越》,《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9日,第9版。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③ 1930年,为调剂米价、救济贫农,闽西根据地最早成立了粮食调剂局。1933年春,中央苏区政府参考这一做法设立粮食调剂总局,并令根据地各县设粮食调剂分局,在每一个大的圩场设立粮食调剂支局。

④ 张帆《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⑥ 柯象峰《中国贫穷人口之估计》,《新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1年);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

⑦ P.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 Liv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9, pp. 31-1216.

⑧ 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

高、劳动强度增大、劳动时间延长等。”^①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了区分,并意识到社会中的贫困群体不仅收入低下,在教育和生活水平上也同其他社会群体存在一定差距。

二是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贫困这一概念进行讨论时,首先将贫困看作生存问题,即由于收入低下导致的生理性贫困。因此他们最重视的还是物质不足,将“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视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②相较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更具复杂性和变化性,它是指人的追求、信念、价值观、习惯等人类理性滞后,缺乏基本生存与发展的技能、方法,无法满足现实生活基本需要的状况。^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在精神上的悲惨境遇。他们意识到,精神贫困是伴随物质贫困存在的,在基本的物质需求都不能得到满足、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恽代英对此写道“成年农民感情薄弱,且受痛苦压迫既经多次,渐麻木不知感觉。”^④长期处于贫困环境中的人会将贫困生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既没有改善生活的途径,也没有改造贫困环境的意识,因而会长久地陷在贫困之中。

三是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根据马克思的定义,无产阶级是指那些“通常生活在大城市”^⑤“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⑥的工人阶级。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生活状态时,无可避免地会论述到城市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内容为团结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关注到的也是城市贫困,其首要体现为工人阶级贫困。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为资本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加重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另外,工人的工资未能随着不断上涨的物价进行调整,实际收入进一步下降。在关注工人阶级贫困问题的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贫困也有诸多分析。彭湃在《农会利益传单》中描述了农民“死力苦耕,不能糊口”“贫穷饥饿之声,无乡不闻”的悲惨状况。^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向农村的全面转移,他们对农村贫困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意识到,与城市贫困有所区别的是,除战争、天气、税赋水平外,农村的贫困主要还受到土地分配状况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的土地集中趋势十分明显。^⑧作为广大贫民的核心诉求,平均分配土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缓解农村贫困、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

对贫困根源的考察,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认识:

首先是制度性因素。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一切贫困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和集中表现,从制度上论述了贫困产生的根源。这一分析也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贫困现实的认识。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劳动者的劳力是产生新价值的核心,然而由于私有产权制度,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微薄的工钱,大部分利益归资本家所有,“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这里来的。”^⑨此外,官僚阶层对底层民众的剥削也是造成普遍贫困的原因。李大钊对此批判道,正是那些自诩为人民谋福利的当政者及其保护制度、社会政策,造成了“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饿殍

① 《李达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② 张宝明主编《中共早期期刊历史系谱》(上),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

③ 吴稼稷《论精神贫困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7期。

④ 恽代英《农村运动》,《中国青年》1924年第37期。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

⑦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⑧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第77页。

⑨ 陈独秀《告劳动》,《共产党》1921年第5号。

遍野”的悲惨景象。^①

其次是国际资本的冲击。随着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工农阶级的贫困问题愈加严峻。同时,受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近代中国工业停滞衰落,持续性饥荒和高昂的物价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加贫困化。在这种经济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劳动平民因为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陷入贫困境地。瞿秋白表达了对国内手工业者生活前景的担忧,他写道“现在还是一种手工业,因为受了经济上的压迫,已经是这样困苦的生活,将来机器的应用多起来,这般手工业者的劳动竞争,又是什么情形,他们还有活路么?”^②国际资本依靠大规模机器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压低产品市场价格,使工人阶层和手工业者丧失就业机会、收入低下,也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因缺乏收入来源,对未来发展失去信心,而陷入“家庭渐次贫困”的境况。^③在这种认知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注意团结农民、工人和学生等群体,^④不断壮大无产阶级规模。

再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认为改善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满足贫困群体的物质需求、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状态有着重要作用。瞿秋白十分重视生产力的作用,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他在《社会科学概论》一文中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这社会实质的根性,所以社会能变动,而且他的变动的主因便是生产力的发展。”^⑤只有“尽量发展生产力……方能渐进于无政府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⑥生产力的提高要依靠“人”的力量,无产阶级在其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因为只有他们具备强大的“组织力”、“经济力”和“政治力”。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却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高生产率机器不仅没能成为增进勤劳大众幸福的工具,反而将数量庞大的工人排挤出生产领域,从而使他们“陷于失业状态,引起贫困的增大和劳动条件的恶化”。^⑦

(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路径探索

1. 反贫困的制度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基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现象,将贫困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将工人农民的普遍贫困视作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土地和资本收为公有视为把工人阶级“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的根本路径。^⑧李大钊更是直接呼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只有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改变多数穷人供奉少数富人的状况,使人人能“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⑨尽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通过发起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时代困境与贫困现状的诉求,但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长时间的斗争。正如邓中夏所言,想要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这种观念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就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状况而言,“实在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⑩

2. 反贫困的实践道路: 发展实业经济。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经济构造在社会中的地位,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也可以随之解决。^⑪1921年,邓中夏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的发言中提到“中国内乱的最大原因,都生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1卷,第12页。

② 瞿秋白《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1919年第4号。

③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1924年第2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⑤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

⑥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25页。

⑦ 《李达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⑧ 蔡和森《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先驱》1922年第7号。

⑨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第354页。

⑩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⑪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

于经济紊乱,故必须早解决经济问题”^①“中国的病源,在于外国经济的压迫,使本国产业不能发展,故游民众多,民生窘困”。^②对此恽代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只有实行工业化才能自立自存。^③发展本国实业对于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谋求国家富强至关重要。

发展实业首先需要资本,但是将振兴中国实业的希望寄托于外国资本或国内资本都是不现实的。外国资本将中国视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场,资助中国转为工业生产国不但影响欧美国家商品的销路,还可能会向其市场输出中国产品,这与资本发展的目标是相背离的。而中国作为农业国,也缺乏独立自主、集中国内资本振兴实业的能力。对此,蔡和森根据近代中国的发展现状,主张在进行社会革命后,“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的实业”。^④另外,李大钊认为,近代中国要想通过发展实业解决贫困问题,需要通过革命建设一个像苏俄一样“公众而强固的政府”,一旦“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⑤因此,他主张由无产阶级组织政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外资开发富源,组织经营实业,对抗资本主义大工业。^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资本来源、组织形式等层面阐述了近代中国实业的发展路径,其根本目的是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为底层人民摆脱贫困奠定物质基础。

3. 反贫困的实施模式:救助与互助并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对普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除工人阶级外,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受难群众、遭受自然灾害的难民和无人照料的孤寡老少也被纳入救助范围。《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中规定“没收土地后,凡无倚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而不能从事劳动者,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⑦1929年6月,面对战争和灾荒导致农民生产和生活陷入巨大困难的情况,鄂东北各县和红三十一师党委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关于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要求政府加强救济工作,“筹办养老、救苦、济贫等事”。^⑧除了在根据地设立粥厂,采取借粮、分粮等措施救济失业工人和灾民外,对于收入已达征税标准,但仍不能维持其家庭基本生活的劳动者,政府也通过免税或减税的政策减轻工农群众负担。^⑨

政府在开展救助的同时,也鼓励民间互助。1922年,彭湃在海丰县组织建立第一个秘密农会,不仅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也在生产生活、医疗卫生、社会救济、基础教育等诸多领域增进农民互助。^⑩此后,多地陆续成立农会组织,其数量和规模不断壮大。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组织设立了互济会和同乡会,号召群众积极参与互助互济、抵制剥削。由于客观历史因素的限制,互济会等民间组织开展的社会救助以生存型救助模式为主,在救助标准、救助内容和救助效率上都处于较低水平。^⑪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贫困治理理念:赋权增能与多方联动

治理理念的形成是“理论—实践—理论”的辩证过程。针对贫困问题,需要在一般理论的指导之下,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进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反贫困理论进行新的规律总结和 content 补充,从而实现理论的升华。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并未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从制度、组织和资本

① 邓中夏《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年会的发言》,《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

② 《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6页。

③ 《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30页。

④ 蔡和森《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先驱》1922年第7号。

⑤ 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

⑥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1921年)。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⑧ 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财政厅合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经史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2页。

⑨ 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7页。

⑩ 《彭湃文集》第16页。

⑪ 席恒、余澍、李东方《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100年回顾》,《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等层面对贫困群体进行赋权增能,推行反贫困策略,初步体现出现代化贫困治理的基本理念。下文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体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早期贫困治理理念进行分析。

(一) 制度赋能:国家主导的反贫困制度建设

1.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给予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物质上的帮助。1922年,邓中夏等人倡议国家制定保障性法律,以“保障工人适当以至低限度之工钱……无论公私企业或机关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此项法律保障的至低限度”。之后更是不断呼吁要求“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①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文提出要“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②除了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险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拟定《劳动法草案大纲》,要求由雇主或者国家为受雇群体购买社会保险。^③1923年,中共三大将“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④为保证最低工资制和社会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中央还设立了监察机构,监督、审定各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额与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情况,切实保证贫困工人的基本权益。

2. 改良生产分配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劳动产物的分配上存在巨大差距,工人阶级只能分到很少的份额。一方面,不合理的生产分配制度加快了阶级分化。陈独秀指出贫富悬殊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佣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⑤工人的劳动成果为少数资本家垄断和掠夺,阶层收入差距愈加扩大。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还会增加贫穷与失业。李达在论述食物与人口的关系时表示,虽然人口的增多扩大了生产,但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反而使得“过剩的食物充满资本家的仓库,过剩的人口欲望充饥而不可得”。^⑥因此他主张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制限”,“对于有限的生产物要行公平的分配”。^⑦李大钊也倡议建立一种民主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⑧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劳动产品分配关系的认识,体现了其要求公平分配、降低贫富分化的思想。

3. 改革土地所有制。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险制度和生产分配制度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工人阶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针对农民的保障则主要是以重新分配土地的形式实现的。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雇农、苦力、劳动贫民、乡村失业的独立劳动者等,不分男女,均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力,并提出“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7年,洛川会议上确立了地主对农民减租减息和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的“双减双交”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有利于联合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也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减轻了农民压力,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

① 《邓中夏文集》,第14、12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0页。

③ 《邓中夏文集》,第14页。

④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内部发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8页。

⑤ 陈独秀《贫民的哭声》,《每周评论》1919年第19号。

⑥ 《李达全集》第3卷,第5页。

⑦ 李达《社会主义底商榷》,《共产党》1920年第2号。

⑧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第291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617页。

尽管中国共产党早期没有明确提出“反贫困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概念,也未能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但其陆续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条例、决定和法案充分彰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福利的决心。虽然中国共产党初成立时的执政能力较弱,未能实现其中诉求,但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独立探索革命道路后,诸多有益的反贫困主张开始逐步成为现实。^①由于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贫困群体采取的救助措施并不算高水平,与现代意义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较大差距。但作为中国共产党自主领导贫困治理的开端,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分配制和土地革命等的推行,改善了由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的民生困苦的局面,为后续反贫困工作的推进积累了实践经验。

(二) 组织赋能: 社会助力的多主体扶贫格局

社会救助是中国传统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不同时期对贫困成因的分析多有差别,政府和社会组织对救助贫民所持态度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社会对贫困的理解多集中在财货的匮乏,且多持个体主义贫困观,即个人要对自己的贫穷负责。^②传统社会各级政府在面对大量等待救助的贫困者时,也通常采取临时性的物质救济,贫困者只能被动等待救助,难以彻底摆脱贫困。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贫困成因的认识逐渐由个人因素论向社会整体论转变,将贫困看作是社会的问题,而“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救助活动时,十分重视工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1920年,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李中和陈焕文组织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该会将团结全体工人、改善工人地位、提高工人生活、培养工人阶级意识、提倡工人团结互助等作为宗旨。在此之后成立的工会组织还提出了缩短工作日、免费医疗、改善卫生条件、实行保险,以及救济失业者、病人和残疾人等要求。^④工会组织成员在为劳工争取较好工作条件的同时,也对他们进行革命理论和阶级意识教育,培养他们摆脱贫困的斗争意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扶贫事业,改善贫困群体的生存环境。李大钊提倡借助各阶层人士的力量,组织有知识、有财力的人成立慈善团体,投身公益事业,从而改善“教育方针、商工事业、政治制度”,以谋求“救济之方”。^⑤

(三) 人力资本赋能: 个体参与的内在能力提升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论述了国家和社会在减贫中的作用,在无产人力资本的提升上也形成了比较独特的观点。人力资本理论注重对贫困者自身因素的剖析,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在于群体缺乏维持生存和促进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和内在动力,消除贫困的核心在于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其知识水平。^⑥哲密孙在《贫困之漩涡》一书中将贫穷称为“致命的病”,认为穷人受制于物质和物质的双重贫乏,他们的贫困程度只会不断加深,而恶劣的教育环境则会将这种贫困代代相传。^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的缺乏会诱发贫困的产生。瞿秋白将普通工人工资低从而导致生活贫困的现象归于“缺乏科学知识,吃力不讨好”。^⑧人力资本贫乏导致他们的竞争能力弱,收入低,他们的子女也会因此重复父母的境遇,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借鉴欧美各国的教育理念,推崇德、智、力并重。陈独秀尤其重视对贫民的教

① 席恒、余澍、李东方《光荣与梦想: 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100年回顾》,《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

② 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③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号。

④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93页。

⑤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第87页。

⑥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0页。

⑦ 赫娄·哲密孙《贫穷之漩涡》,许善斋等译,上海广学会出版社1927年版。

⑧ 瞿秋白《中国的劳动问题? 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社会》1919年第4号。

育,倡导“从事贫民教育,当教以劳工之尊严,摆脱一切奴性”。^①他认为西方教育理念是行之有效的,“经济学之生产三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资本……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其个人之生计,必不至匮乏”。^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使义务教育惠及每一个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越是贫困的地区,越需要“研究科学,传播科学”。^③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倡推行职业教育,在产业部门成立工人预备学校,提高工人的职业水平和政治觉悟。^④这表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减少贫困、增强自主能力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扶贫先扶智”的现代减贫理念。

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早期已具备初步的现代救助观。第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归因性贫困观,而是更接近现代的社会归因性贫困观。他们不再将贫困群体的成因局限于家族和婚姻制度,而是认为国家和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忽视也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他们主张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吸收各界力量,为帮扶对象提供有效救助。第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救助对象的认定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妓女、失业人员等弱势人群也被纳入其中,扩大了救助范围。第三,打破了平均分配、同等救助的救济思路。相对于中国传统救济理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主与平等意识均有所加强,主张针对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救济模式,并提倡弱势群体要提升自救能力,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暂时救济,而要通过接受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来消减贫困。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为一般贫苦青年提供基础教育的目的是:一方面培养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帮助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让无产阶级的贫苦青年认识到,资本家的剥夺使他们陷入贫困,鼓励其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人力资本减贫理念与现代人力资本减贫理论是存在区别的。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的特征与经验启示

自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便不断借鉴马克思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分析,并将其运用于中国反贫困实践。尽管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对于贫困与反贫困已经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反贫困思想,也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特征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阐述始终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初步形成了以近代中国基本国情为认知基础、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为核心目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实现路径的反贫困思想体系。主要呈现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形成了多维度的贫困考察视角。中国共产党早期对贫困的认知已经涉及精神贫困、相对贫困等领域,并围绕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基础教育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但受制于近代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其主要强调的还是物质贫困,首要目标是保障贫困群体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第二,拓展了贫困治理理念。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贫困成因以及消除贫困的途径时,突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贫困观和救助观,倾向于从社会环境层面考察近代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在减少贫困的具体策略上,主张运用制度变革、发展实业提升国家经济能力,鼓励以社会互助和个人发展相结合的模式救助贫困群体。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分配”,并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均分财富,而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所得生产成果为社会所共有,体现了初步的“社会共治、全民共享”的思想要素。第三,

① 陈独秀《答王禽雪》,《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

②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

③ 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1919年第3号。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基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等角度对反贫困的实现道路进行论证,丰富和积累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运用经验。这些论述对中国共产党早期联合无产阶级发起工农运动产生了重要激励作用。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注重宏观反贫困策略,对自身能力分析相对较少。尽管他们也重视基础教育的推行,但对于人力资本提升和减贫之间的关系认识还不充分。由于经济和生产力的客观限制,中国共产党早期推行的反贫困实践规模和数量都比较小,救助方式简单,反贫困效果相对有限。中国共产党早期基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分析贫困现象,注重对反贫困路径的探寻,但在理论层面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解释与转述,整体研究深度不够,未形成完整的系统表达。

(二) 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探索的经验启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社会现实,对贫困的成因、消除途径以及反贫困问题中主客体关系的核心理念,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基础性与关键性问题,都有认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论述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与贫困作斗争的开始,不仅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泉,也为当今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优化反贫困事业的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定减贫策略时,尤其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组织无产阶级进行工人运动,积极开展自救活动。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领域都提出相应的反贫困措施并付诸行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贫困事业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①当下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伟大成果的关键就在于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优化反贫困事业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对复杂多变的贫困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并采取契合的反贫困措施。因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事业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科学开展反贫困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坚持内外联动,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贫困不仅是收入不足引发的“贫”,还是相较于社会中其他群体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制度等相关领域权力的缺失,是物质、社会和情感等多方面的相对匮乏。因此,除了政府组织的物质救济,他们还主张通过贫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来提升工人阶级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增强个人摆脱贫困的能力。这种外部救济与内生建设相结合的反贫困策略,为中国新时期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借鉴。贫困群众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依靠自身摆脱贫困,使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是阻断返贫路径、提高减贫效率的关键。在引导政府救助资金和优惠政策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同时要注意持续加强教育建设,对贫困群体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科学文化水平,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

第三,坚持精准扶贫,因地、因时、因人推行反贫困措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论述了各类贫困概念,更在识别贫困类型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反贫困主张。当前,随着中国全部贫困县实现脱贫,中国区域性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的解决,中国贫困属性与特征也迎来重大转变。进入“十四五”阶段后,相对贫困成为主要表现形态,散点分布性贫困取代区域性贫困。在此背景下,贫困治理工作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反贫困战略的设计既要考虑到项目实施对象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又要认真分析和选择扶持对象。只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考虑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不同特点,才能改变政府资金盲目投入的局面,做到精准帮扶,巩固减贫成果。

第四,坚持强农是强国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早期在确立农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19页。

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后,在农村推行了一系列减贫措施,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事业最显著的成就是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贫困发生率逐步下降。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扶贫开发的标准、目标和战略任务也发生了改变。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出台,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①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也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环节。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②。现阶段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衔接仍然存在着体制机制衔接不畅的问题,新时期反贫困工作要求探求二者有效衔接的途径,在推动脱贫攻坚纵深发展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稳健推进。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反贫困论述与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与贫困作斗争的开始,也蕴含着共同富裕的理论要素,如“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的社会诉求,^③反映出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对社会主义分配的主张,则强调了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已转变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探索中所确立的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和发展思想,也将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重要历史启迪。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on and Pluralistic Governance:

A Study of the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Fang, Wang Xiaobo

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been committed to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a long and arduous struggle to get out of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broadest masses.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Li Dazhao, Chen Duxiu, Qu Qiubai and others, took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as the goal based on studying the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poverty and weakness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yste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y advocated alleviating povert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te-led anti-poverty system, strengthening social mutual assistan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 capital in light of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dern China. The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the CPC fully revealed the strong vitality of the Marxist theory and initia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anti-poverty theory. It has provided not only ideological sou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nti-poverty policies and its practice in China today.

Keywords: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on, Pluralistic Governanc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i-Poverty Thought

(责任编辑:马烈)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1版。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第354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